

塘沽文史资料辑

(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塘沽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一月

塘沽文史资料辑
(二)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天津市塘沽区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一月

目 录

- | | | |
|-------------------|-----|---------|
| 塘沽地区概况 | 孟庆华 | (1) |
| 夜袭美军弹药库 | 武 宏 | (3) |
| 王亚平在塘沽 | 张志礼 | (7) |
| 范旭东及“永久黄”工业团体发展小史 | 徐 盈 | (10) |
| 范旭东在苦海盐边创业纪实 | 张高峰 | (28) |
| 侯德榜博士生平事略 | 侯虞競 | (49) |
| 我在永利碱厂五十年的见闻回忆 | 郭炳瑜 | (52) |
| 半个世纪前的永利艺徒班 | 张荣善 | (83) |
| 科研先行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 陈竞生 | (89) |
| 大沽炮台兴废小史 | 孟庆华 | (97) |
| 北塘民俗 | 于耀明 | (105) |
| 曹锟家族对人民经济的掠夺和压榨 | 陈世如 | (115) |
| 黎元洪与北塘早期教育 | 于 辉 | (129) |

塘沽地区概况

孟庆华

塘沽位于津市东侧，地居东经一一七度，北纬三十九度，是天津市的一个港区，距津市四十五公里，面对渤海，北有京山铁路，海河横贯中央，津沽、津塘两条公路分布南北。地处水陆要冲，有我国第一个人工大港——天津新港，塘沽车站是京山线上重要枢纽。工业、交通在津市和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当地盛产鱼盐，是华北著名的渔场和盐场。

塘沽地区在古时，海口北岸是一片沼泽地带，原为滨海退淤之地。海口南岸是一个小的渔村名大沽，故海口称大沽口。

大沽口是我国北方的重要口岸，也是塘沽地区的要隘，自古以来，为海防重镇。明朝时期曾在南北两岸驻重兵，清朝屯兵设防，在两岸筑炮台，以做北京的屏津。清朝以后的各军阀，都派精锐部队驻扎。现在是首都北京通向海洋的东大门，又是天津的海防前哨。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北方，皆把大沽口作为进攻天津、北京的突破点。

大约一千年前，精沽地区是一片汪洋，据有关历史地理资料

记载唐宋时代，现在塘沽地区东北九十华里的宁河县芦台至塘沽西五十华里的泥沽一带，是渤海的海岸线。唐朝末年，芦台称“海口镇”。宋朝时期，泥沽称“泥沽海口”。芦台西南和泥沽东南都是大海。

公元一〇四八年（宋庆历八年）以后，黄河改道由山东入海。海河入海口和渤海湾的海岸线，便从泥沽附近，东迁到塘沽地区的大沽口一线。尽管这个时期，塘沽地区，还布满沼泽，尚无人迹。

塘沽地区形成陆地的时间，据考古工作者初步认为，约在元朝，即七百余年前，那时塘沽地区已是滨海低地，并出现了贝壳堤，但仍是水网密布，有些地方芦苇丛生，“始有人烟”。贝壳堤当地人民一般称为“岭子”，迄今仍有遗址，后来岭子上有人居住，并以岭命名，如今大沽南面三十多华里远的渔村高沙岭。

早年大沽地区是苦海沿边，相传大沽最早的名字叫“花儿寨”，最早的居民住在草头沽，那是一片荒凉的盐碱地，生长些芦苇和杂草，仅两三户人家，用芦苇草泥盖起小土房。最初因无生路，多靠要饭活命，所以这花儿寨的花儿是指要饭的叫花子。

大沽的名称据说和山东有关，古时山东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难民到处流浪，山东半岛上有条河叫大沽河，经常泛滥成灾，居民因难忍饥荒，外出逃生来到“花儿寨”，在附近找块地方搭棚住下，为了生活，四处寻找出路，习惯称是大沽河人，这样大沽的名字就叫起来了。如今仍有些居民的祖先，就是大沽河人。

大沽有了居民之后，外地灾民和劳苦的人民，陆续到达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地，有些出关的难民，也转道于此安家。或是织网捕鱼，或是“煮海为盐”，促使当地的渔盐业发展起来。随后，邻近各地的劳动人民，便来大沽谋生，人口不断增加，逐渐形成了村落。

夜袭美军弹药库

武 宏

因事到天津塘沽，顺便探望在区委工作的老战友李振武同志，他拿出一个笔记本给我看，上面贴着几幅一九四七年的《大公报》剪报，头一篇网行大字标题是：“新河美军又遭攻击，共军抢军火库，一度恶战”。内文开头写着：“共军武宏部队约数百人，携迫击炮四门，于四日晚十一时许突向新河南西南二道桥之美陆战队弹药库袭击”。还有“两大火药库爆炸，炸声震动离塘沽三十里之天津市。”

这个历史材料，把我的思路一下子拉回到解放战争的年月，使我忆起那渤海之滨战火硝烟的情景。

日本投降以后，美国侵略者为了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远渡重洋，运来了大批美式武器、弹药、装备，支持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屠杀中国人民。他们在塘沽新河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美军弹药库，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加装师中将司令官何华德负责，并派重兵看守。美国侵略者与国民党顽固派狼狈为奸，走

马圈地，在塘沽新河北面四五华里处兴建了这个弹药仓库，纵横约六华里，使附近老百姓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稻田、苇塘和草地，美国兵不仅常常抓人运军火，而且在塘沽港横行霸道，群众非常愤恨，迫切希望我宁河县支队打击这些“美国佬”。年初，我们就曾派出小分队对弹药库进行袭击，作了火力侦察，后来又派出侦察班长毕洪志同志，在群众积极配合下，对美军兵力和弹药库情况进行了细致了解。我当时任支队长，虽然对这一带情况比较熟悉，但还是和部分同志再次化装前往看了地形地物和敌人新增加的工事及障碍物，然后拟订战斗方案，明确了主要突进口。

当时，只有从塘沽区新河小镇一条很窄的公路通向弹药库，塘沽驻有美草装甲车队，新河驻有伪警察四分局数十人。经研究决定，派二连去新河负责打警察局，破坏电路，并阻击塘沽敌人向弹药库的增援。因已了解弹药库四周有水深约两米的护墙河沟及铁丝网，每百多公尺即建有炮楼和暗堡，守备较严，所以我们确定三连从东面佯攻，一连从北面主攻，待二连在新河打响后即发起对弹药库的攻击。但也要求灵活执行，如在弹药库敌人发觉我军行动并开枪射击时，一、三连可不等二连打响就展开攻击，二连即使打不下警察局，也可起到阻击增援之敌的作用。

除了我们县支队三百余人，另有三个区小队随行，还动员了三百多民工，这样，共有八百人。区小队的任务主要是担任警戒和负责抬担架，民工是准备搬运弹药的。

部队听说要打弹药库，都非常高兴。因为那时战斗频繁，我军弹药缺乏，一支步枪仅有十来发子弹，一挺机枪也就百十发子弹。同志们说，咱们就是因为子弹少，打敌人有劲也使不出来，美国仗当了运输队，这是个好机会。有了子弹，战斗胜利就有保

障了。

从我们驻地奔袭美军弹药库，要过好多道小河沟，天冷水寒，涉水不仅影响体力，还会引起感冒。为保障战斗行动，干部战士想办法制作了一些折叠式带绳子的小木桥板，随身携带，架设都方便。显示了群众的智慧。

四月三日晚上，部队带着干粮和咸菜，轻装向南疾进，于四日抵达黑猪河北面的扁担岗村外盐碱地壕沟里隐蔽起来。对于过路行人，暂时扣留，以免走漏消息。至天黑以后，部队分别向目的地运动，晚上十一点多钟，二连迅速包围了新河伪警察分局。敌人有的已睡了，有的还在打麻将，被二连的同志打个措手不及，并迅速切断了高压电源输电线路，破坏了敌人的漏明设备。在弹药库的美伪军听到枪声，也警觉起来，因电灯已灭，他们胡乱打枪，我们立即发起攻击，一、三连同时展开进攻，冲过敌人防护壕沟，切断铁丝网，猛打猛冲，首先“端”了几个炮楼，向纵深发展。敌人组织反扑，被我军击退后又组织二次反冲锋，企图顽抗，我正面部队正与敌激战，一连一个班已进到敌左侧，两面夹攻，才击溃了敌人。同时三连也在遭敌阻击后勇猛冲杀，和一连的同志迅速把敌压向西南角，集中火力，把美伪军打得死的死，逃的逃，乱成一片。战士们打开仓库，搬起铁皮弹药箱子敌走。当时没有汽车和马车，虽是几百人，也只能搬一小部分，后面的同志就一面掩护大家撤离，一面向弹药库房敌油点火，边点边敌，很快就听到弹药爆炸声，象开锅一样，乒乒乓乓，轰轰隆隆，比过年的炮竹还热闹。为避免援敌围追，我催促部队和民工快走，因连夜奔袭，非常疲劳，弄得我的眼也睁不开了，援火药库阵阵爆炸声却正好成了催醒剂。正走着，只听一声巨响，象地震一样把我掀点儿掀倒，有的同志说，美军弹药库上天了，让咱

跳舞啦。敌人报纸说的爆炸声震动天津市，可能就是指那阵子巨响。二连已从新河方向撤过来。我们就迅速撤到黑猪河边。美军装甲车队跟着从塘沽开过来，我们的部队、民工都已扛着弹药箱胜利归来了。据老乡们后来说敌人的弹药库爆炸声，一直响到第二天，塘沽地区很多老乡家的窗户纸、玻璃都震碎了。

这次战斗，共击毙伤美伪军六十余人，缴获机枪二挺，卡宾枪、步枪四十余支，搬回炸药二十多箱，子弹十万余发。但美国造的那些子弹头长，我们的一般步枪无法使用，陆续送到分区兵工厂去改造了。这次战斗，我们有六七个同志伤亡，特别是二连党支部书记牺牲了，我的心情很沉痛，他不但作战勇敢，多次战斗都冲在前面，而且政治思想工作做得活跃，是一个好指挥员，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这一仗主要是摧毁了美军弹药库。因爆炸声连天震动津塘，国民党的报纸也无法掩盖。《大公报》却只报道说，“军火库当即起火焚烧”，还说这次战斗，“美军陆战队阵亡五名，伤十六名，伤亡士兵之姓名候通知家属后再行发表。”

弹药库被炸，美军陆战队和它的那个中将司令官何华德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五月一月，《大公报》报道，美国已决定将军火库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引用了何华德讲得很有意思的话，即“何氏并称：此举与其谓为移交，不若谓之为美方将军火库放弃。”为什么放弃？因为那已是一堆废墟了。而国民党又有什么可接收的呢？直到冀东解放，国民党始终无人来过问了。

六月，美国政府把何华德和陆战队一师都分别调回。这分明是夹着尾巴逃跑了，天津伪报纸还为其涂脂抹粉，说什么：“他们在海外服役已跑年限了”，真是打肿了脸冲胖子。

人民群众对此是无比高兴的。说是县支队不简单，袭击美军

弹药库，赶走美军司令官，蒋介石的靠山败得惨，冀东人民把身翻，国民党反动派就要完蛋了。

这次战斗是远距离奔袭。战前一阶段，我们不露声色，以造成敌人的疏忽麻痹。侦察敌情、地形，都比较细致。事先估计到全部消灭敌人也不可能，因此除了夺取部分弹药外，搬不走的，就炸毁它，以显示我军威力，打击美蒋气焰。由于设想和战斗编组合理，白天在扁担岗隐蔽得好，封锁消息成功，加上干部战士英勇顽强，敢于在敌占区打硬仗，在敌重兵把守的地域拼杀，人人自觉性强，迅速接敌至五十米处，敌人都未发觉，所以冲得进，撤得下，保证战斗顺利完成，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震动了美蒋反动政府和军队，敌报纸在四月七日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袭击者训练颇优。”同时，也大大鼓舞了敌占区、解放区，特别是京津塘一代的广大群众。

（铁志整理）

王亚平在塘沽

黎志礼

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这一天是塘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的全权代表岗村宁次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东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全权代表前斌，在塘沽伪满

铁路公司运输部办理处（现边防检查站南部）一幢英式小楼，签定了《塘沽协定》。消息传来，群情激愤；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觊觎华北的阴谋，首先在塘沽扶轮小学（现铁路二小）展开了。其组织者，就是我国著名作家、诗人王亚平同志。

王亚平同志一九三〇年，因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通辑，化名来到塘沽扶轮小学任语文教员。他在学生中间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使不少热血青年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王亚平以塘沽为背景，写的反映农村破产、百姓逃亡，都市黑暗的长篇叙事诗《都市的冬》，在学校和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许多学生和工人（如我区一九三六年入党的闵树甲等同志）都团结在他的周围，把他印的号召反帝爱国的传单散发到塘沽各界。

王亚平本人在回忆塘沽这段历史时说：“我目睹从东北开来的火车，难民挤在车顶上，从塘沽过天桥时，有人喊：‘天桥！天桥！趴下！’那些人因心破的难民，有的突然站起，有的跌下，有的被天桥碰个头脑血烂，真是人间之惨莫于此”。当时他愤笔疾书、写了《孩子的提问》、《大沽口》等诗。号召青年和人民起来革命，不当亡国奴。为了揭露国民党卖国求荣，他还写了剧本《香槟酒》，讽刺了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当时反靖流落到塘沽，王亚平与曼晴、林娜、孙茜等一起参加宣传活动，出版了《紫破星》，团结了广大革命的进步青年。另外他们还集中二十多名青年成立了中国诗破会河北分会，编印《新诗破》发表大量反帝反封建诗作。

由于地下党的领导，加上“左联”的战士，革命青年一致奋起，塘沽和北京、天津的青年一样市发起来，革命的气势很快波及全塘沽。给伟大的抗日战争造成了催生剂！

王亚平同志在塘沽活动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用诗歌为武器，积极从事革命和进行文艺活动。他不仅是诗人，而且是向日本法西斯进行英勇斗争的战士。

王亚平同志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曲协副主席，是一位多产作家，后因胡风案牵连，一度停止了创作活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又拿起笔，积极从事文学创作，一九八三年四月，因忙于为《茅盾全集》写序，为香港杂志写稿，过度劳累，哮喘病发作，逝世于北京家中。

在纪念国际反法西斯斗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告慰王亚平同志的是：他所描写的塘沽黑暗的冬天已永远过去。现在塘沽农村兴旺，城市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全区各界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为建设一个先进的、文明的现代化港口城市而努力奋斗！

范旭东及“永久黄”工业团体发展小史

徐 盈

一、盐

一八八〇年左右，清朝开始兴办学堂。湖南省湘阴县范氏两兄弟先后离开家乡到了长沙，进入当时闻名全国的时务学堂，后来又先后考取官费赴日留学，于一九一〇年先后回国。哥哥范源廉（一作源濂）在日本专攻教育，与蔡锷、梁启超交游，很早就参加反清的政治活动；弟弟范旭东在日本西京帝国大学专攻化学，有志于“科学救国”。在哥哥的援引下，弟弟开创了中国现代的国防化学工业事业，建立了一批中国从未有过的制盐、制碱、制漆（铵）的工厂。范旭东利用海水，为打碎旧引岸制度而走过的这条道路，十分坎坷、迂回、曲折。

戊戌变法，对年青时代的范旭东影响极大，他曾这样写道：

记得辛亥革命前十几年，满清政府曾一度试行新政，他们知道非废八股，设学堂，振兴农工商业不能立国，所以在戊戌维新前后一百天中，一切新政设施，颇为有声有色，应有尽有。清廷严令各省奉行，尽管有些人反对，但也是有些奉行的。

据说各省中间以湖南省为最起劲。这到不足为奇。因为恰逢其会，许多特殊人才，都集中在湖南，有陈右铭、

黄公度诸位名宿主政，梁任公先生掌学，地方人士有皮庵门、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一班活活泼泼的壮年名士，最凑巧的是陈右铭的公子陈伯严极端热心地暗中活动，才使湖南省新政盛极一时。

他们的新政设施，短期间样样都做了一点，开了一个时务学堂，出版了《湘报》和《湘学报》两种刊物，和民众接触的就是那空前的南学会，实行通俗讲演。梁任公为南学会作序，力言要强中国，首先要上自政府下及士农工商有团结的热情。我还记得几段，他说：“八股即废，学校即兴，商政即修，农工即恤，而上下之无维系，学脉之勿沟通，人心无热力，虽智其民，犹不能国其国。……”他见国势阽危，不可终日，在几篇文章上又大声疾呼：“敌无日不可来，国无日不可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为谁氏之藩，眷属不知为谁氏之奴，魂魄不知为谁氏之鬼。……”何等悲切，不忍卒读。^①

范旭东就是受当时这些主张新政的人的影响，大开眼界，改变思想，不去做官发财，立志走救国救民的新路。一九一一年民国改元，范旭东从日本回国，先经他哥哥范源廉介绍到工商部当上一名他不必做事的闲官。一九一二年，又经梁启超的安排，随同一批理财官员到欧洲。但他却去考察盐政与制盐工业。归国在塘沽登陆时，他看到塘沽的盐坨成山，而盐民世代承受引岸制度的压榨，却穷困到无法生活，在“盐胡涂”中间过着艰苦无边的日子。范旭东认为中国盐政积弊必须整顿，长

^① 文内范旭东的话，均引自《海王》旬刊。

期以来“富归盐商”的状况也必须改变。

对当时清冷的清景，范旭东曾这样描写：

……大沽口，不是夏天的样子。每一块荒地到处是盐，不长树木，也无花草，只有几个破落的渔村，终年都有大风，绝少行人，一片凄凉景象，叫你害怕。那时候，离开荒庚子国难不过十几年，房舍大都被外兵捣毁，砖瓦埋在土里，地面上再也看不见街道和房屋，荒凉得和未开辟的荒地一样。

后来，范旭东就在荒凉的塘沽买下了一块曾被帝俄占领过的土地，他自称为中国的化学工业开辟“耶路撒冷”。一九一四年的下半年，范旭东在塘沽的一个渔村小屋里，开始做制造精盐的试验。这个消息传出后，使死寂多年的“盐胡涂”掀起了空前的波澜。范旭东倡议创办久大精盐公司炼制精盐，遭到世袭的吃盐饭的盐商反对，诅咒它“不久不大”，但却因为得到一批盐官的支持，他的办事业之火，才未被扑灭。

久大精盐公司成立之初，资本只有五万银元。当时是由张謇、梁启超、范源廉等赞助下集股的，蔡锷也是较大的股东。董事长由财政部的盐官、办《盐政杂志》的景学钤（韬白）出任。那时精盐制造的第一步就是使用平锅再制粗盐，为此也就出现了第一批制精盐的平锅，掀开了中国制盐技术史上新的一页。从此各地也办起十几家精盐工厂，精盐工业在国内各地普遍开花。

十年后，久大精盐公司与旧盐商一场血战，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精盐企业。年产量由最初的三万担增至五十万担，约合三万吨。资本由原来的五万元增至二百五十万元。工厂设在塘

沽，公司设在天津，分销售遍于南北各省。所用粗盐原料除仰给于滩户外，又自购盐滩数处，才算站稳了脚跟，精盐销路虽受限制，但行銷极旺，获利甚厚。

久大精盐公司在第一个十年里，与新旧盐商有斗争有联合，从而成长起来。据长芦四沽代表四十二户灶户的灶首张文洲回忆说：“一九一六年，我在长芦盐运使段永彬的批准下，在宁河县汉沽附近大神堂，以利海公司名义投资，开辟了新滩六付。久大精盐公司成立以后，经过段芝贵（段永彬是他的三弟）的介绍，我将利海的六付盐滩出售给久大，又订立了长期合同，指定盐滩十九付（包括我家九付）全部供给久大原盐。时价每包四十元，我们降为每包三十八元，但还是供不应求。”“芦纲公所总纲李赞臣大为恼火，从中破坏，不准灶户四十二家供给久大原盐。又经新盐运使张调宸有意以此四十二家原盐转供河南境芦纲襄八公所。这时，另有灶户李少堂，愤将自备盐滩十付及房屋设备，以十万元售与久大，使其生产不虞匮乏。”

久大精盐公司未被扼死于襁褓之中，从此自有盐田二千余亩，原料（粗盐）无缺，脚跟站稳，不怕芦纲公所的杀手锏了。

一九一六年，久大的赞助人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和盐务署督办。这一年，久大精盐打破禁区，进军长江，指向有一亿一千吃盐户的淮南四岸。当时两淮盐荒，已有十八家精盐商号在沿江的长沙、岳阳、湘潭、常德等地做小量试销。一九一八年，范旭东把在汉口的十八家精盐商号组织为汉口精盐公会，实现了“精盐联营”，由在搞湖南“自治”的谭延闿的老友萧豹文等出面，促成烟台通益精盐公司的黄文植担任会长。发动湖南、湖北各县商会向省议会请愿，要求运精盐济湘济鄂，为久大精盐打开新的市场。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八年，久大在

天津的精盐工厂，由两所扩充为四所以至六所。一九一八年，久大公司接收了德国在塘沽的铁道支线，收买了沿海河的俄国码头。就在这一年的一天，范旭东曾在南京沿江大饭店的楼顶上，放着鞭炮，迎接在他的塘沽码头装上久大精盐的怡和公司英轮驶进长江口，向着武汉等埠进发。以后，又将姊妹公司青岛永裕的精盐陆续济湘，声势就更大了。

一九二〇年，范源廉再任教育总长，对久大公司的发展更为有利。久大公司利用汉口精盐公会的力量，打开两湖销路后，跟着又在九江组织九江精盐公会，虽被淮南四岸的旧盐商视为劲敌，但在当时赣北镇守使吴金彪的弟弟吴朗山支持下，另设九江精盐查运所，名为“查禁”赣盐，实则为精盐统计销数，一次就倾销精盐四千余袋，久大逐渐取得了淮南四岸的半壁天下。

一九二二年，北洋政府收回日本在青岛的盐田，范旭东以八十万元得标，与山东盐商组织永裕盐业公司，下设永大、裕大两厂。永大承办十九所制盐工厂，裕大则承办收回的盐田。当时日本产盐有限，年仅十兆担，但消费量平均年达十五兆担。欧战时，日本占领青岛，扩大盐田，每年输日本的食盐为数更有增加。这次盐田被北洋政府收回时，双方商定由中国每年向日本输出青盐三百万担。从此，永裕盐业公司得北洋政府的批准，成为青盐外销的专商，取得我国盐产输日的供应权。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塘沽成为军事必争之地，长芦盐运使张廷谔假直系吴佩孚的势力勒索久大，生产冻结，直到冯玉祥班师方告段落。次年，奉系直隶督军李景林会同直隶财政厅长郝鹏、盐运使张同礼在天津绑架范旭东。范被拘禁在所谓兵灾善后清理处内，由前大总统黎元洪（久大的一名股